

成

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
与中西交流百年

罗元旭 著

东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St. John's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就

卜舫济 杨宽麟 王正廷 颜永京
曹子实 鲍咸昌 夏瑞芳 李政道
颜惠庆 李叔青 朱友渔 晏阳初
宋家姐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

014039256

B979.2
45

东 成 西 就

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
中西交流百年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北航

C1726678

B979.2
45
罗元旭 著

东成西就

——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

罗元旭 著

责任编辑

石雅如

书籍设计

typo_d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 64001122-3073

传真:010 640027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170×240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00千字

印 数

4000册

I S B N

978-7-108-04509-6

定 价

5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 / 罗元旭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5

ISBN 978-7-108-04509-6

I. ①东… II. ①罗… III. ①基督教史—史料—中国—近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4208号

本作品版权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授权出版简体中文版,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北航

C1726678

014039256

B979.2
45

东 成 西 就

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
中西交流百年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北航

C1726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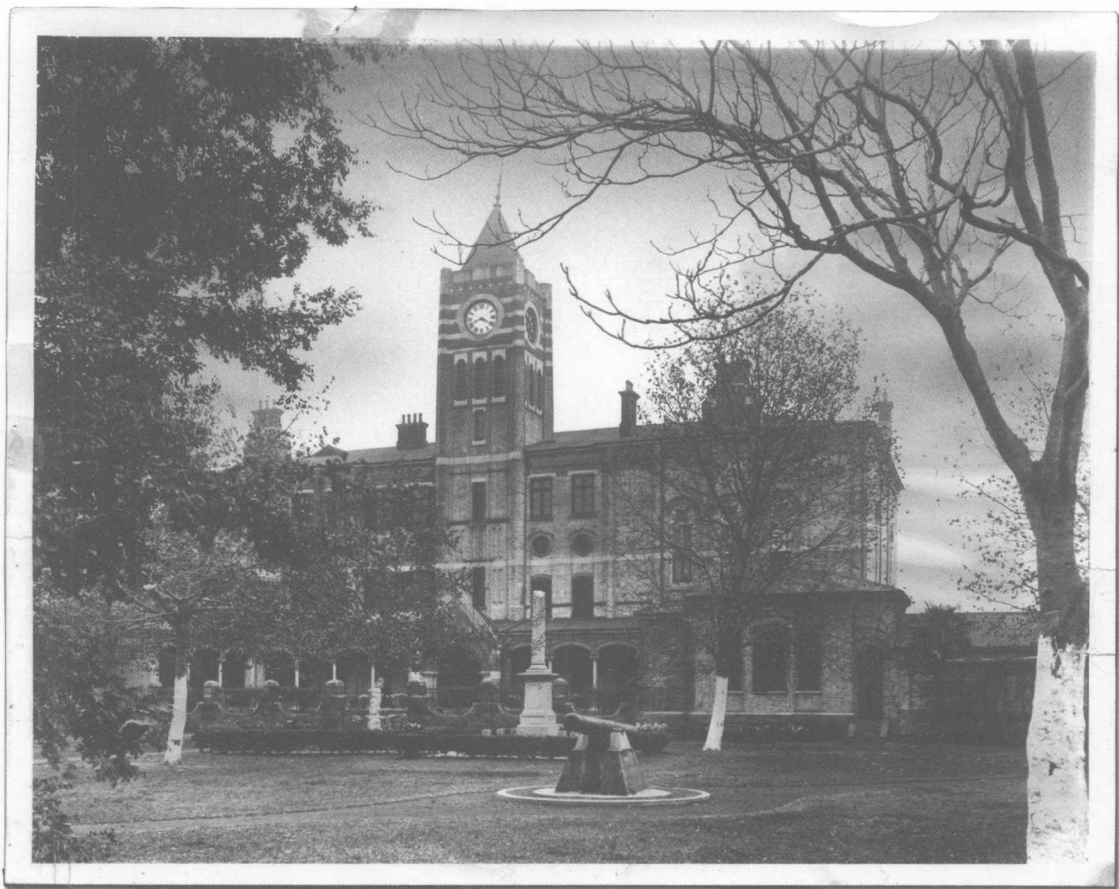
B979.2
45
罗元旭 著

中国交通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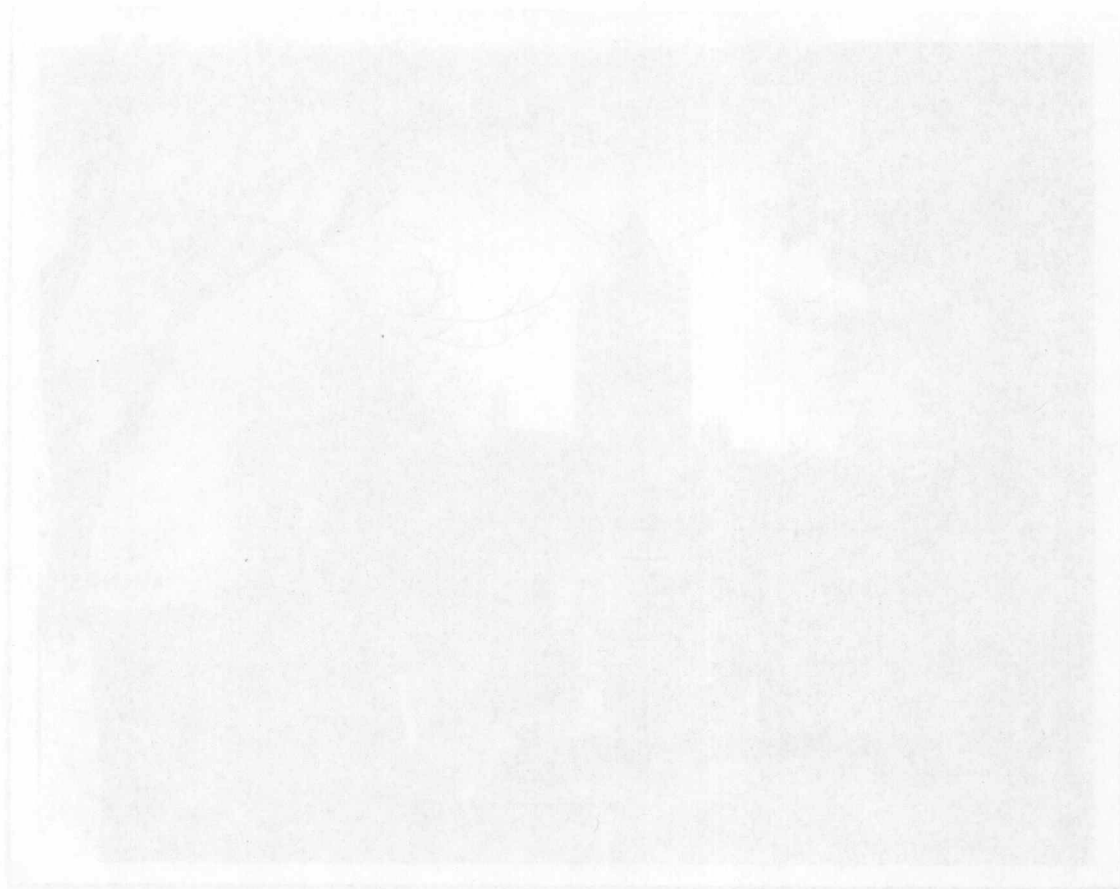
东吴大学校园（苏州大学前身）

由美南监理会牧师曹子实创办的存养书院进化而成，李子义牧师后代多人从该校毕业及参与校政，倪牧外孙婿孔祥熙曾任该校董事长。该校培养大批司法及文化名人如杨铁梁、金庸及赵朴初等，是近代中国知名教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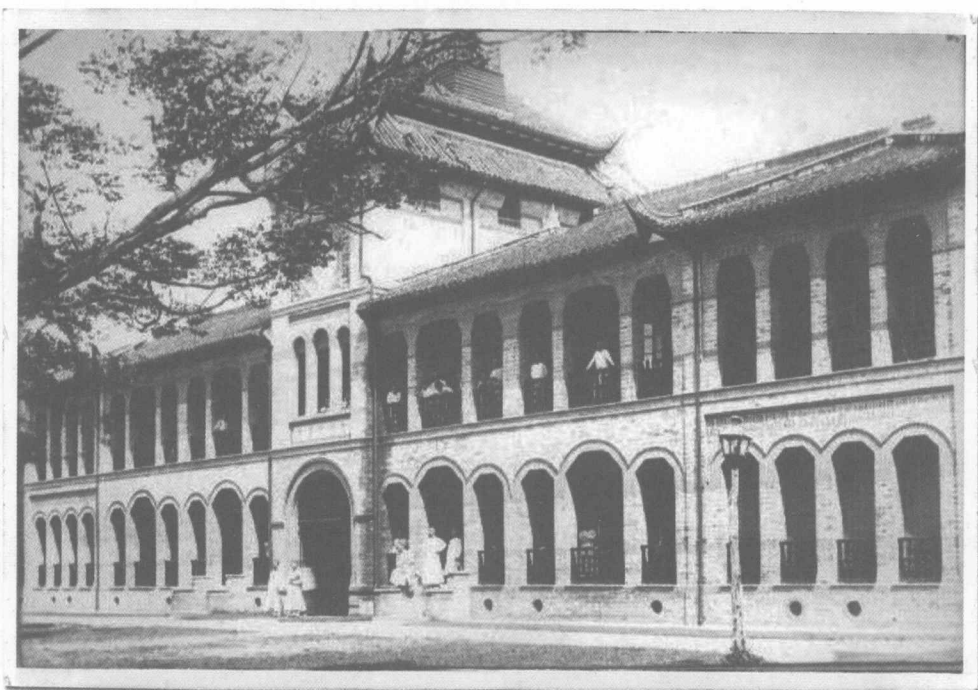
阿爾斯蘭大學校園

阿爾斯蘭大學校園，位於阿爾斯蘭大學校園內，是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該建築由阿爾斯蘭大學建築師設計，並由阿爾斯蘭大學建築師建造。該建築於1910年建成，並於1911年正式開放。該建築是阿爾斯蘭大學校園內的一棟重要建築，也是阿爾斯蘭大學校園內的一棟重要建築。該建築是阿爾斯蘭大學校園內的一棟重要建築，也是阿爾斯蘭大學校園內的一棟重要建築。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园

由美国圣公会牧师颜永京参与创办，黄牧女孀卜舫济任校长多年，黄、颜两家多人参与校政，其余五家族亦有多人从该校毕业，在校任教或当校董，是近代中国影响最深的基督教高等学府。图为主楼怀施堂，现称韬奋楼，以纪念圣约翰毕业的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创办人邹韬奋。



上海南京路中法大藥房

中法大藥房在上海南京路，建築宏偉，設備完善，是當時上海最大的藥房之一。該藥房由法國人創辦，經營各種西藥、醫療器械等。其建築風格融合了中西元素，具有濃厚的歷史感。



上海商务印书馆厂房

由长老会牧师鲍哲才的子婿创立及后人经营，黄牧公子佐庭及颜牧公子惠庆曾任编辑。倪牧女婿宋耀如为股东，李牧长孙骏惠曾为化学顾问，许牧女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教材亦由其出版，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之一，通过出版在当代中国教育普及化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今日的网络时代，或然率（概率）的计算方式彻底改变了。以前成功几率几乎是“无限小”的事，现在通过网络的虚拟世界竟然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穿越现实世界的时空而遽然实现了。我和本书作者罗元旭的萍水相逢正是这个“新或然率”运行的结果！

2010年本人怀着无奈的心情在台湾出版了《李叔青医生：中国教会复兴的先声》（李叔青是本书七个基督教家族中李子义牧师的三子）。那时之所以感到无奈是因为在从事李叔青（1875-1908）后裔追踪的漫长过程中，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竟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最后，我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掌管或然率的上帝去解决了。

万万没想到，我的新书出版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收到罗元旭君的电邮。我们交换了有关李叔青家族的资料后，发现罗君所研究的七个基督教家族竟然一半以上和李叔青有姻亲关系。通过罗君我也联络到李叔青在上海的嫡曾孙李鸿捷（Roger Lee），并且从李君获得关于李氏家族的全部资料和照片。这样我终于能够在2012年5月简体版《李叔青医生》（北京九州出版社）中把李叔青以及和他有关的基督徒家族间的“姻亲网络”清楚地拼绘出来。目前李君也正在从事他的家族史和清末“留美幼童”史的研究。李叔青的岳公温秉忠也是“留美幼童”之一。温秉忠和宋庆龄父宋耀如是连襟；宋娶了倪蕴山牧师二女桂珍；温娶了倪牧师之女秀珍。宋庆龄和宋美龄成年后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众所周知的。

就纂述历史的性质来看，《东成西就》与目前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东成西就》是把上海地区七个基督教家族，以巧妙的架构和流畅的笔法，编织成的一部基督教“家族复合史”（composite history of families），是一部以崭新的视角对这些家族之间纵横交叉的“姻亲互联网”的研究。在汉文的世界里，无论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西教士的传记（如戴德生），或是华人教会领袖的传记（如陈崇桂和倪柝声），都是局限于对主角生平研究的“个案史”。能够完成一部基督教“家族复合史”实在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

第二,《东成西就》是一位业余史家以专业史家的治学态度,和“竭泽而渔”的史学方法去穷追史料,而创造出来的一部历史著作。无论是对文本文件的利用(如蒋介石日记)、或对电邮访问的汇集(如黄光彩牧师曾孙郭颖颐)以及对主角的家谱(如鲍哲才)和手稿(如王正廷未公开的自传)等数据的利用,都展示了罗君卓越的“史才”(引史学大师钱穆语)。

第三,《东成西就》具有西方史学界特别重视的“修正性”(revisionism)。这也正是目前大陆和港台新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一致的取向。例如,20世纪以来中外主流史学界对宋耀如家族和他的女婿蒋介石的评价,除了宋庆龄是唯一例外,一般都倾向于负面的诋毁,而其史料的根据却常来自谣传,罗君根据孔祥熙和宋子文的个人信函等一手史料破解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他们贪污致富的指控。同样,目前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国民党档案的开放,中外学者们终于能够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写抗战史”(参考2012年8月26日《世界日报》美洲版)。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永远不要忘记“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7日),年仅八岁的我聆听到“蒋委员长”慷慨激昂地呼吁全国军民一致团结抗日的讲话后,立刻就号召我村石家庄镇头二街的小孩子们组成“秘密抗日”的弹弓队。对于一个深夜我队利用泥土作成的弹丸“袭击”一幢日本兵正在其中干坏事的房门的壮举,在将近八十年后的今日,我仍然记忆犹新!

最后,本人愿意从西方在华传教史的角度对罗君的巨著加以评论。同时希望也能从“属灵”的维度上对《东成西就》的内容稍做补充。

美国神学思想家拉尔夫·埃默森(Ralph W. Emerson, 1803-1882;罗君定居的美国历史名城康科德(Concord)是他的故居)曾有一句名言说:“一切的历史著作都是传记(All history is biography)。”诚然,“人”是历史的主人和中心。没有人哪里来的政治史(人治理人)、社会史(人际群体的关系)、外交史(国人和外人的交往)和传教史(西教士对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人”又有“内心和外在”之分;而二者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organism)。另外“人”的社会和经济的地位也有“上下”之分。把这两个模拟应用到西方在华“传教史”的范畴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们当初在

中国传教的两种“策略”。

因为西教士是根据清廷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的，因此在中国“人”眼里，他们就好像是带着医药和救济物资的红十字会成员乘着一艘海盗船登陆的外国人一样，一般中国人自然会对他们持有怀疑和敌视；而上流社会的士大夫们自然更对他们不屑一顾。一切的“教案”和“惨案”都因此发生。

当美国圣公会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和美南监理会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的传教士于19世纪进入中国后，他们起初只能采取“先外后内”和“先下后上”的宣教策略。因此最初接受福音的信徒都是社会最下层衣食无着的贫民和那些为传教士服务的门房、工友一类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因着“外面”物质生活的需要才去“入教”。

但是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后，上海地区随着外贸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当地“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苏州原本就是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1842年后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随着外贸的急剧发展，到了世纪末竟然取代了苏州经济霸主的地位。这个期间，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促成了由“下”而“上”的社会移动 (upward social mobility)。同时西教士也就把他们的福音对象转向这个新兴的华“人”的“上”层。罗君的《东成西就》详细描述了七个基督教家族如何从“下”层的微寒群体而“上”游到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并且还成为影响近现代中国命运至深的两个“贵族教会学校”的共同创建者！

第一个学校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立的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简称“约大”；另一个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苏州建立的东吴大学 (Soochow Univeristy)。此外，同是监理会在上海创建的中西女塾 (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 是宋庆龄姐妹和众多20世纪中国妇女名人的母校。

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好些方面和美国的哈佛和耶鲁相似。从《东成西就》中我们清楚看到大约在20世纪前半，在“属世”方面，对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医疗各领域的贡献既大又广。东吴大学在同时期虽然在“属世”方面的贡献比不上约大，但是

也相当可观。不但如此，东吴大学在“属灵”方面，为了中国教会的“灵命复兴”和信徒人数的急速增长而产生了世界级的教会领袖，乃是东吴大学的女子医学院产生了中国第一个女奋兴布道家余慈度（1873-1931；她的姐姐是东吴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杨永清的母亲），也是从东吴大学创建人之一李子义牧师家族中产生了中国教会的“施洗约翰”——李叔青医生。李叔青启动了中国教会复兴的浪潮，此后，更多“属灵”的后裔从中国把普世福音传扬的方向盘逆转过来。

从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西教士退回西方，但是李叔青和余慈度的“属灵”后裔们把基督的福音从中国反馈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本人访问过的世界重要城市，包括日本、东南亚、东西欧、中南和北美以及南非等地，我都看到了华人传教士们的“佳美脚踪”。

在巴西，站在万人的礼拜堂里布道的人不是说葡萄牙语的本地人，而是一个初中毕业做五金生意的宁波人；在马尼拉训练菲律宾人如何布道的传教士是一个带着山西口音、从国防医学院毕业的中国医生；在美国、俄国、乌克兰和波兰，以及英国、非洲甚至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都有受过一个烟台人培训出来的华人和白人传教士站在讲台上布道的盛大场面。即使在加勒比海中的千里达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人们也会发现以客家人为主的华人传教士的踪迹。至于从“中国基督教特区”（温州）出去的“商人教士”，他们所展示的宣教热忱和他们制造的高档鞋子都是遍布全球众多城市的“中国现象”（China phenomenon）！

这一股从中国大陆涌流到世界各地的宣教浪潮和华人宣教士为着宣扬普世福音所展示的努力和热情，正如今日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强势崛起，同样赢得国际间的赞赏和尊重。当我们目睹国人在政经和宣教领域里所赢得的“双料金牌”时，我们岂能忘记《东成西就》中七个基督教家族和他们那些“属世”的和“属灵”的双重后裔们为他们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所做的重大贡献？

吴秀良 (Silas Wu)

波士顿学院历史系教授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2年8月28日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相遇史。这相遇 (encounter) 的历程中有相冲 (collision)、亦有相融的成分和时期。而一般论著却偏重相冲之说,甚至于看整个过程为中西文化的冲击。“近代西方”、“传统中国”变成两个不同价值观的对峙。张之洞19世纪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道出了这看法在心理上很令人满意(两得其全),但是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同一机体不可仅有“用”而另一机体仅是“体”。当时,严复已以“牛体、马用”喻之谓不逻辑。总之,持之以久,“文化两端化”之说难免留下文化交接“没有美满结果”、“不消化”的感觉。

本书七家族史称意取题为《东成西就》。作者罗元旭君,拥有业余史家的兴致,配上专业史家的见识而去其拘谨,以流畅的文笔写了一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史。在这七个家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接下可有高度的相融调和,并且在近代史上,无论是宗教、教育、政界、经融、商业、外交、美学、建筑、体育、出版业、医务、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方面,贡献多姿多彩的建设。这七家史并非一般光宗耀祖之作,其涉及面之广,以及搜寻工作之精密,充分陈布了七家族的个人和集体的经历及建树,尤其是在近代极度动荡的年代中的建树。因此它亦应当提供给历史的阅读者抑或细研者相当宝贵的材料和启示。最值得我们考虑深思的,是如何看待和绳量近代化中的“中——西”、“内——外”、“体——用”、“本——末”、“东——西”种种问题。文化相遇过程中能获好果的是相冲还是相融?

郭颖颐

檀香山

2012年8月中旬

(郭颖颐为黄光彩牧师外曾孙,曾任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及教授多年)

序三 (中译)

可能是因为生长于老上海的基督教家庭，有很多事情我都习以为常。由父母两边的祖上算起，我是第四代基督教徒，所以我自小以为所有人星期天都到教堂做礼拜，或许是不同支派的教堂。另一个共识就是因为基督教家庭之间相互通婚，很多人都是我的亲戚，我表亲的表亲的表亲亦成为我自己的表亲。

青年史学家罗元旭有寻根究底的精神，加上记忆力好，我亦很乐意为他提供各家族关系的来龙去脉及数据，作为本书的基础。我个人亦深觉如现在不把这些家族的故事记录下，恐怕有失传的可能。无论如何，这些基督教家族对上海社会的发展有深厚的影响，亦因而对全中国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的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正如罗君在著作中记述，部分家族后人推动中国以至美国的发展，直至今日。

史济良 (Julian Suez)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外孙)

Having been born into and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in Shanghai, I took many things for granted. Being a 4th generation Christian, on both my father's and my mother's side, I assumed everybody went to church on Sundays, possibly to churches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Another matter of fact was that everybody was, somehow, related to everybody else. The relationship was mostly by marriages. So, a first cousin of a first cousin of a first cousin of mine, would be a cousin of mine, as long as I know who married whom, was a sibling to whom, or was an in-law of whom, etc.

Enters York Lo, the young historian. He has an inquisitive mind and remembers many facts. I was pleased to provide York with many of the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provide some base of his book. I happen to realize that if these family backgrounds are not documented now, they would be lost forever. Like it or not, some of these Christian familie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way the Shanghai society evolved, which in turn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from the mid-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mid 20th Century.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se Christian families brought on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even rippled, to this day, to US, as York clearly has documented in his book.

Julian Suez (史济良)

A grandson of Zoen Fong How (夏瑞芳), Founder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